

晚清东南士人的书院生活世界

—以秦际唐为中心的考察—*

王胜军^{***}·袁媛^{***}

- 一、从学：秦际唐与钟山、尊经与惜阴书院
- 二、执教：秦际唐与奎光、凤池书院
- 三、雅集：秦际唐与书院内外士人群体
- 四、余论

【中文摘要】

仔细爬疏晚清史料,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书院是晚清士人生活世界的重要平台,不少士人一生的求学·执教·雅集·撰述等几乎都在书院中展开或与之紧密相关.同治间肄业于钟山·尊经·惜阴书院,晚年主讲奎光·凤池书院,学堂既兴之后又迭充传习所总教员及初级师范学堂教务长的秦际唐,作为一代书院学人的一个缩影,其书院生活深刻地折射出晚清东南士人共同体内在的精神世界和生命追求,说明书院是士人共同体的会集之地,是实现其人生价值的主要舞台,这一现象是晚清东南地区学术史·教育史与士人生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书院, 秦际唐, 生活世界, 东南

* 이 논문은 2019년 대한민국 교육부와 한국연구재단의 지원을 받아 수행된 연구임(NRF-2019S1A5C2A02082813).

**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43182329@qq.com)

***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在读硕士(1065072047@qq.com)

【국문초록】

청대 말기 동남(東南) 사인(士人)의 생활 세계

－ 진제당(秦際唐)을 중심으로－

왕승군(王勝軍)·원원(袁媛)

명청 시기 사료를 살펴보면 하나의 주목할 만한 현상이 발견된다. 바로 서원은 청대 말기 사인(士人)들의 주요 생활 환경이었다는 것이다. 사인들은 대부분 평생 서원에서 학문을 닦고 강학하였으며, 모임에 참여하고, 저술 활동을 하는 등 서원에 속하거나 그에 관련된 일을 하였다. 진제당(秦際唐)은 동치(同治) 연간 종산서원(鍾山書院), 존경서원(尊經書院), 석음서원(惜陰書院)에서 수학하였고, 만년에는 규광서원(奎光書院), 봉지서원(鳳池書院)에서 강학하였다. 학당(學堂)이 생겨난 이후, 그는 전습소(傳習所) 총교원(總教員) 및 초급사범학당(初級師範學堂) 교무장(教務長)을 역임하였다. 서원의 사인 가운데 한 사람으로서, 그의 서원 생활에는 청대 말기 동남(東南) 지역 사인 공동체가 지닌 정신세계와 삶의 경향이 드러난다. 이는 서원이 사인 공동체의 모임 장소이자, 그 인생 가치를 실현하는 주요 무대였음을 의미한다. 이러한 현상은 청말 동남 지역의 학술사, 교육사 및 사인(士人) 생활사에 중요한 한 획을 긋는 것이다.

주제어 : 서원, 진제당(秦際唐), 생활 세계, 동남(東南)

秦际唐,字伯虞,上元人,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¹,卒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咸丰十一年(1861)拔贡第1名,同治六年(1867)乡试中式第171名举人²,光绪六年(1880)六上礼闱,“同考官异其文,力荐诸主司,传观赞叹,竟不得第”³,此后遂绝意仕途,专心从教。秦际唐是“石城七子”⁴之首,以诗名咸同间,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楨·左宗棠均激赏之,张佩纶称秦诗“情深律细,初无随园晚年滑率之病,风格实在庆历之间。”⁵而其为文“自君亲师友下逮民物,低徊咏叹,显微阐幽,绵邈曲折,循若无端,令读者或歌或泣而不得自主也”⁶,刘声木赞其文曰“婉而能达,纡回而有致,不规规学韩,而旁薄于班·马两家之史法。”⁷秦际唐生平私淑姚鼐·曾国藩,为学“益严归·方·刘·姚,若统系然。”⁸著有《南冈草堂诗选》《南冈草堂文存》《南冈草堂时文》等,参与编纂

1 关于秦际唐的生年共有两说:一说为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秦际唐在同治六年乡试卷上自述其“道光庚子年生(1840)”,其表弟何延庆在同治十二年乡试卷上自言“道光壬寅年生(1842)”,而何在《南冈草堂诗选序》里称“外兄秦君伯虞少长于余家,长余三岁,可互相印证。一说为生于道光十八年(1838),见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秦淮人物志》等书,其材料来源或取之于陈作霖在《秦伯虞司马诔》“(伯虞)光绪三十四年(1908)夏四月二十八日卒于里,第历春秋七十有二”以及秦际唐《南冈草堂诗选》“光绪辛丑(1901)季夏既望,际唐自识于金陵讲院之寄生居,时年六十有五”,由此逆推而得。然而“七十有二”·“六十有五”皆为古人虚岁之数,所逆推者恐有误,故以乡试卷之自述为准更妥。

2 陈作霖,《秦伯虞司马诔》,《可园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9页。

3 张佩纶,《南冈草堂文存序》,《南冈草堂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541页。

4 “石城七子”是同光年间活跃于南京的一个士人群体,“七子”分别是秦际唐·朱绍颐·陈作霖·何延庆·顾云·邓嘉缙·蒋师辙,翁长森辑有《石城七子诗抄》,“石城七子”由是得名。

5 张佩纶,《南冈草堂文存序》,《南冈草堂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541页。

6 濮文暹,《南冈草堂文存序》,《南冈草堂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543页。

7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第198页。

8 张佩纶,《南冈草堂文存序》,《南冈草堂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

《国朝金陵文抄》《(同治)上江两县志》《(光绪)续纂江宁府志》。

秦际唐早年肄业于钟山·尊经与惜阴书院，晚年主讲奎光·凤池两书院。庚子之变后清王朝改弦更张，废书院兴学堂，尊经·凤池两书院改立校士馆，后又改为师范传习所，光绪三十二年(1906)复改为初等师范学堂，秦际唐先后迭充传习所总教员，初级师范学堂教务长⁹。秦际唐一生与东南书院结下了深厚的渊源，在书院的从学·执教与交友构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篇章，而以秦际唐为中心的金陵文人则以书院为媒介，师生讲习，文人往来，谱写了一个时代士人的书院生活世界。

一· 从学：秦际唐与钟山·尊经与惜阴书院

秦际唐“高祖天祐，太学生”，“祖学诚，邑增生”¹⁰，其父秦士科早卒，时秦际唐方四岁。家道中落，母亲何氏守节抚孤，以纺织佐生计，以经书授子嗣，“每届岁暮必令际唐背诵一岁所读书，破窗风雪一灯焚。际唐手一卷，太宜人刺绣其侧，或诵昌谷·香山诸集以和之。际唐倦甚，则令暂卧顷刻之，复促使读寒钟卷。”¹¹在母亲殷切期盼下的秦际唐力学不倦，声名日起，但平静恬淡的少年生活终在其十四岁时被战乱摧毁殆尽。咸丰三年(1853)二月，太平军攻克南京，时秦际唐随母依外家居陶氏园，户外杀声沸腾，万众奔走，舅父何师孟“从容集家人，置酒笑且言”¹²，誓以死效法屈原。二月十三日黄昏时分，薄暮苍烟，何氏率先殉难，秦际唐随母投池，得邻人相救不得死，“生既不能

541页。

9 陈作霖，《秦伯虞司马诔》，《可园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6册，第109页。

10 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148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第201页。

11 汪士铎，《何氏太宜人墓碣》，《南冈草堂诗选续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535页。

12 秦际唐，《丁亥孟冬展先生太孺人墓泐然有作》，《南冈草堂诗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503页。

为藜藿之养，死复不能为桐棺之敛”¹³是秦际唐一生的遗憾。这一年的南京城乱，死者难记，存者惊心，“自大府以至丞倅皆殉焉，其时衢巷火光□昼夜不绝，垣墉栋□之属倾折如万霆，官私陂池积尸几满”¹⁴，秦际唐的母亲何氏，老师陈自超·马庆瀛皆在这场灾难中殉节，读书人忠君爱国的观念以最惨痛的经历刻进了秦际唐的精神世界。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秦际唐流离乡外，萍踪靡常，大约活动在东南一带。咸丰十年(1860)与陈氏匆匆婚嫁，“何期三日，近郊烽火，羹汤未调，急装已裹”¹⁵，后由苏州到松江(今上海)，三百里程，稍获安居却倏惊转徙，是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进攻上海。十二年羁旅播迁，思乡之情未肯忘却，圣人之学亦不敢懈怠一日，秦际唐一直潜力笃学，整身躬行，终于在咸丰十一年(1861)取得拔贡第一名。拔贡自乾隆七年(1742)定制为“十二年一举”，名额为府学二名，州·县学各一名，“历届岁·科考取经古及一等最多者”¹⁶在资望审核合格后才能应考拔贡，考选难度之高可见一斑，第一名的好成绩亦足觐秦际唐学识之卓越。同治三年(1864)，在外飘蓬的秦际唐忽闻湘军攻破南京，心下茫然，不敢相信，待万口喧传确认无疑，才喜极而泣，写下诗歌《甲子六月十六日官军克复江宁喜而有作》，一句“料理归装载行李，秋风一棹还家乡”蕴含着多少对故土的眷恋之情，而归乡的秦际唐也开启了人生中最悠闲自得的书院时光。

南京自古物盛人众，魁奇辈出，这得益于传统·地理·教育诸因素，而“书院讲学实为金陵人文气氛的催发者和重要组成部分。”¹⁷其中，钟山·惜阴·尊经

13 秦际唐，《陈葆常先生稀龄撮记序》，《南冈草堂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549页。

14 秦际唐，《同治上江两邑志忠义谱序》，《南冈草堂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544页。

15 秦际唐，《祭亡室陈孺人文》，《南冈草堂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565页。

16 商衍鎤，《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7-38页。

等书院最为知名,钱大昕·姚鼐·胡培翬·潘谔等名儒硕彦都曾在此间讲学。然太平军兴,南京洊经丧乱十二载(咸丰三年至同治三年),弦诵之风荡然渐灭,乃至“横舍荒余无寸甃”¹⁸。同治三年湘军克复南京,曾国藩面对“江南人文渊薮,夙多朴学之士,乱离之后,流风遂沫”¹⁹的巨大对比,“为往圣继绝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无不催促其复兴文教,而以文教来稳定人心·纲维国本亦是戡乱金陵后的首要选择。于是钟山·尊经·惜阴等书院相继重建,各方文士相与谈道讲业,颀颀上下,一时东南坛席又呈现之前的风流盛况。

早岁遭患难,学殖皆坐废,乱后馆舍复,名儒讲斯席,秦际唐大约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进入南京钟山·尊经·惜阴书院求学的。关于其具体入学肄业时间可据陈作霖的日记推断一二:同治四年(1865)二月钟山书院复建,陈作霖是首批生徒,其称“是岁,始交通州姜璜溪渭·扬州刘恭甫寿曾及同里秦伯虞际唐·陈耘芬光熙·何善伯延庆诸君,皆书院肄业友也。”²⁰尊经书院亦是同治四年复,同治五年(1866)李鸿章又复惜阴书院,而秦际唐在同治六年乡试卷上业师一栏填写有“周缙云(现主讲尊经·惜阴两书院)·李小湖(现主讲钟山·惜阴两书院)”²¹。再至同治七年(1868)薛时雨接周学浚主讲尊经书院,秦际唐出入相随,光绪十一年(1885)秦际唐感怀恩师时称“奉手十七年。”²²可以逆推,种种迹象表明,自同治四年起,钟山·尊经·惜阴书院依次复建,秦际唐就基本上同时在这三所书院中肄业。

秦际唐所肄业的这三所书院教学内容各有侧重,教学旨趣亦不尽相同。钟

17 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51页。

18 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二六《金陵杂述四十绝句》,同治六年刻本,第83页。

19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复周缙云侍御》,光绪二年刻本,第618页。

20 陈作霖,《可园备忘录》,卢海鸣主编,《教谕公稀龄撮记·可园备忘录·夙叟八十年经历图记》,南京,南京出版社,2020年,第62页。

21 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148册,第204页。

22 秦际唐,《瞻桑根师遗像感而有作》,《南冈草堂诗选续编》,《清代诗文集续编》第734册,第504页。

山·尊经书院是当时“时文书院”²³的代表，专课举子业，“上以承天子作人之化，下以副大吏培材之意。”²⁴惜阴书院则可归入“古文书院”，以经史词章为重，默培诸生根柢，“使日讲求有用之学，无仅耗心力于时艺。”²⁵

秦际唐在三所书院主要研习的是与科举相关的四书文和诗赋，并成为生徒中的翘楚。冯煦²⁶曾言，“时书院翘材生有三党：宁党秦际唐伯虞为之魁，浙党唐仁寿端甫为之魁，扬党刘寿曾恭甫为之魁。”²⁷据笔者统计，专门收录四书文的《尊经书院课艺》一刻收录秦作26篇，二刻收录16篇，三刻收录21篇，四刻收录40篇，五刻收录32篇，六刻收录17篇，分别占全编的16%·27%·19%·12%·14%·12%。而以赋作为主的《惜阴书院课艺》东斋收录秦作13篇，西斋收录68篇，另有《惜阴书院赋课择抄目录甲部》收录秦作5篇，分别占比6%·32%·10%。要知孙锵鸣在编《钟山书院课艺续选》时“尽发府署所存前列卷二千余篇，博观约取，又得二百八十余篇”²⁸，用稿率低至10%，课艺由于“集隘，不能多载，遗珠之惜，诚所难免”²⁹，秦际唐一人课艺收录之多也足征其才气

23 近代学者曾将清代书院分为三种，即“时文书院”（专课八股文，有的兼课试帖诗）·“古文书院”（专课经史词章）·“新学书院”（专课时务之学·泰西之学）。参见鲁小俊，《晚清古学书院的教学风貌——以武昌经心和黄州经古书院课艺为中心》，《孔学堂》2021年第8期。

24 薛时雨，《尊经书院课艺序》，《尊经书院课艺》，《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一辑第37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7页。

25 胡培翬，《研六室六钞补遗》卷1《惜阴书院别诸生文》，道光十七年刻本，第486页。

26 冯煦，字梦华，号蒿庵，江苏金坛五叶人。少好词赋，有江南才子之称。光绪八年（1882）举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安徽凤阳府知府·四川按察使和安徽巡抚。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以遗老自居。参与纂修《江南通志》，撰有《蒿庵类稿》等。

27 冯煦，《蒿庵随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第64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613页。

28 孙锵鸣，《孙锵鸣集》，胡珠生编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29 华世芳·缪荃孙，《龙城书院课艺》卷首《凡例》，光绪二十七年刻本，第1页。

斐然。

成绩之拔萃实得益于平昔研书之用力，秦际唐当时在书院主要阅读内容当为十三经·五史·四书及《读书杂志》《杨园先生集》《古文辞类纂》等经典的四部书籍，此外于西译新书如《重学》《几何原本》《则古昔斋算学》亦可能有所涉猎，可从同治十年(1871)惜阴借书局所藏书籍加以推断³⁰。秦际唐当时既是惜阴书院的生徒，也是借书局簿钥出纳的主要负责人，特殊的双重身份使之具有丰富的时间·精力及机会阅读书局藏书。在优越的读书环境下，秦际唐还受曾国藩的影响采用“治经之法”专习“《史》《汉》《三国》《通鉴》《说文》《文选》等书”³¹，并在老师孙锵鸣的建议下多读词章，期望通过旁搜远览，铺章摘藻“求为沉博绝丽之才。”³²此外，其四书文与诗赋征引文献典故等亦可以推断秦际唐读书的部分内容。在客观环境和主观意图的促使下，秦际唐阅读了大量不同种类的书籍，积累了相当深厚的知识素养和诗词文储备量，上能进思尽忠，下能应题而作，为未来的科举和文教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际唐在三书院从学时期逐步奠定了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即以书籍为媒介体天地之源，归本圣人之道，非徒志在参加考试以博取升官发财之资。观秦际唐解《子贡曰诗云如切已矣》一文，其言：“求训诂者，识其字而不明其理事词章者，泥其粗而未究其精。骤与之言，终未见其可耳…而见浅见深，絀绎焉，以寻其旨趣，引申触类，三百篇皆可作如是观也”，秦际唐认为读书要切磋琢磨，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在知来藏往中达到形上形下的融会贯通，即“由一境以赅万境，可与补已亡之篇。由一诗以括全诗，可与析无邪之义。”³³秦际唐所追求的是在高文典册中究精明理，在古人之功修验以今人中益著

30 汪士铎等纂，《(同治)上江两县志》卷12《艺文上》，同治十三年刻本，第414-417页。

31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复周缙云侍卿》，光绪二年刻本，第618页。

32 孙锵鸣，《孙锵鸣集》，胡珠生编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1页。

33 秦际唐，《子贡曰诗云如切已矣》，《尊经书院课艺》，《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一辑 第37册，第111-112页。

学中之境,本经史发文章,以阐明性命天道。这与昔日陶澍告诫尊经诸生“夫即末可以知本,有得于经,则根茂实遂,言中体要,皆经之精液也。无得于经,虽猎取浮华,譬彼行潦之水,朝盈而夕涸耳”³⁴之理念一脉相承。

此外,秦际唐在科举诉求·书院教学宗旨及读书理趣的共同影响下,行文风格形成了“清隽雅驯”·“义理宏深”·“情文相和”等特点,颇得三书院的文化精髓,这些特征借秦作所得之评语得以清晰展现(见表一)。

〈表 1〉同光年间尊经书院部分课艺收录秦作评语举要³⁵

题目	点评人	评语	课艺名称
《子贡曰诗云如切已矣》	李方伯(芑园)	识解高超,笔亦清刚隽,上上下下,虚神不失分寸,可称此题合作。	《尊经书院课艺》
《子路曰愿车马(二节)》	周山长(学浚)	密咏恬吟,文境到恰好处。	
《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	涂太尊(宗瀛)	俯仰上下,气度雍容。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至可使足民》	梅方伯(启照)	含苞振采,文笔鸣凤,妙在气充词沛之中,仍有纵控自如之乐。	《尊经书院课艺二刻》
《斯民也合下一章》	曾中堂(国藩)	专以单行抒写题情,墨气湔洗殆尽,沉郁顿挫,俯仰低徊,饶有二方笔意。	
《大车无輹(二句)》	薛山长(时雨)	靠定信字,说法正喻双关,安详大雅,又能处处留住虚步,是为制艺正轨,否则繁称博引,只是一则车輹考耳。	《尊经书院课艺三刻》
《五谷者(一节)》	何制军(桂清)	意精词隽,学养兼优。	
《曾子曰慎终追远(两章)》	薛山长(时雨)	刊落浮词,阐发实义,有典有则,庄雅不佻。	《尊经书院课艺四刻》
《非其义(二句)》	薛观察(福辰)	起讲一气旋折,方家举止,起比题前着笔,元箸超超,故题位愈窄,文气愈宽,入后层层勘实,笔笔凌空,精细似玉墙东,警透似方集虚,才自应一时无两。	

从上表可知,诸考官十分欣赏秦际唐“安详大雅”“意精词隽”“刊落浮词”的文章风格,或者说是秦作先契合了他们对文章“清真雅正”的首要要求。盖“清

34 陶澍,《陶澍全集》卷六《文集》,陈蒲清主编,长沙,岳麓书社,2017年,第110页。

35 薛时雨,《尊经书院课艺》,《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一辑 第37-42册。

真雅正”作为清代八股文考试的官方衡文准则，官僚山长也许正是通过严格把控考课的取稿标准来告诉生徒“正确”的行文方向。很显然，具有强烈科举诉求的秦际唐，自愿自发地将文风锤炼成符合时代要求的“清雋雅驯”。尤其当秦际唐肄业于举业氛围浓重的钟山·尊经书院时，专门为科举打造的四书文考课、日常学术训练，以及老师“平昔论文一遵今天子清真雅正之音”³⁶的学术观点，无一不在将其读书写作与科举考试紧密缠绕，而秦际唐卓荦的考课表现也展示出他与科举考试的高契合性。但需注意的是，钟山·尊经书院虽重视科举文教育，但未肯丢弃“制艺原以代圣贤之言”³⁷的理念，而另一性质的惜阴书院更是要求学生四海治乱中自觉内省寸衷，以古文词章为手段涨士人之气·国之元气·广己而造于大。当时在三所书院肄业的秦际唐很自然地受到这些学术观点的感染，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考试技巧性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³⁸，其文章不自觉呈现出“宏深义理”“气充词沛”“情文相生”之特点。

秦际唐在课程中出类拔萃，同时意味着他能获得一份稳定的膏火奖励。清代书院膏火制度“是一种以地域为中心的公共性教育资助，是对寒士的一种补偿福利。”³⁹南京书院的膏奖历来丰厚，以光绪年间的尊经书院为例，官课“超等三十名，每名二两二钱；特等七十名，每名一两一钱。初二日膏火，每月共一百四十三两。”⁴⁰顾云亦言：“书院故事，月二日课于官，给膏火银颇厚；山长课以月十六日，十人外无所给，筹之郡绅，始给如官之半，士多资焉。”⁴¹与

36 薛时雨，《尊经书院课艺三刻序》，《尊经书院课艺三刻》，《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一辑 第38册，第364页。

37 朱珔，《钟山书院课艺序》，《小万卷斋文稿》，《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94册，第236页。

38 程嫩生，文洋，《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2期。

39 刘琪，《清代书院的膏火奖赏——以助贫养士为中心》，《教育评论》2006年第2期。

40 汪士铎等纂，《(续纂)江宁府志》卷五《学校》，光绪六年刻本，第192页。

41 顾云，《桑根先生行状》，《盩山文录》，《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59册，第695页。

“一年的收入只有5两至10两银子， 再加雇主供应的饭食”⁴²的底层劳工相比， 成绩优异的秦际唐取得的膏火奖资足以应付一家人的日常家用， 甚至略有盈余， 事实证明也是如此： 直至光绪十二年出任奎光书院山长前， 秦际唐并未另谋如幕僚·训导·从军等稳定收益门路，“举人”身份也许会让秦际唐参加如光绪八年治理赤山湖等带有一定薪资的绅士事务， 但自同治四年起的二十二年间秦际唐的生活始终围绕考试读书展开， 他来回奔波于书院和考场·南京和北京， 书院的膏火津贴应是其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自小家境贫寒的秦际唐却在此期间饮酒作宴不断， 光绪六年还另聘妾室金姬， 光绪十年(1884)南京雪灾他曾拿出一大笔钱财赈济， 光绪十二年又修葺落成了南冈草堂， 种种迹象表明， 秦际唐在书院的头角峥嵘为其保证了相对充裕的物质条件， 这也是支撑及激励其潜心笃学·专志折桂的重要因素。

除了获得稳定的生活环境， 秦际唐在书院这个自由轻松的场域中， 还凭借真才实学得到了高度的自我价值认同， 且通过切磋交流初步搭建起了人际网络。 时书院山长李联琇·周学浚“皆能宏奖后进， 振拔单寒”⁴³， 对才华横溢的秦际唐尤为青睐。 同治十年主讲尊经书院的韩弼元“生平少所许可， 独于际唐奖借不容口， 暇辄翫以古人立身之义与诗文源流。 际唐所业稍进， 而齟齬之者蜂然并起， 先生弗顾也。”⁴⁴“夙有怜才癖”⁴⁵的薛时雨曾赞秦作“情生文耶， 文生情耶， 得此种文都为—册， 令人不复思杨用修·马章民矣”， 将秦际唐比之杨慎·马世俊， 字里行间尽是对高徒的惺惺相惜。 秦际唐抠衣隅坐， 与师长们析疑今古， 论学纪事， 得一字褒， 珍于千金。 需要注意的是， 当时秦际唐便

42 贾米森，《中国的土地占有和农村人口的情况》，《皇家亚洲学会杂志·华北分会·新系列卷23》，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2页。

43 秦际唐，《瑞华馆文稿序》，《南冈草堂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548页。

44 秦际唐，《翠严室诗抄跋》，《南冈草堂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576页。

45 陈作霖，《薛桑根师挽词四首》，《可园诗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6册，第245页。

常随师长饮酒高会，通过师长结识了张裕钊·薛福成·孙文川·曾国荃等名流达贵，诸前辈们古道热肠，奖掖后进，于秦际唐有知遇之恩。

秦际唐与书院同门时有切磋之乐，诸生“每值风檐角艺，夜漏数下，灯火荧然，文成则拍手呼啸以为乐”⁴⁶，扃门课试则“各从其曹，议论蜂起，旗鼓分张；迨一艺成，则互相纠赏，虽至曙鼓将鸣，犹未尽散。”⁴⁷秦际唐在交流切磋中所展现出的才华和资历也为其获得了同学的高度肯定。顾云和秦际唐同列“石城七子”，谊属同辈，但其曾在信函中尊称秦际唐“伯虞大兄夫子大人”，足觐顾云对秦际唐的尊重和钦佩。七子中的邓嘉缙亦言：“如秦陈诸公分属前辈，未敢友视”，字里行间皆是对秦际唐的敬慕之情。在悠然自得的书院氛围中，秦际唐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一起修志著述，互相酬别往来，别离之时雁帖满篋，酒酣之际互订婚约（秦二女世芳嫁陈长子诒绂；何季女曾许秦次子世兰，何女殇后作罢），云天高谊，笙磬同音。

秦际唐还通过官课得到了高级官僚的认可。尊经书院月二日课于官，达官贵胄得秦文章皆惊为吏才。孙衣言评其文“风神绵邈，情文相生”“心细手和，面面俱到”，秦际唐对这份赏识感激在心，“竊器忽逢大匠赏，相期盤错如霜松。针芥不顾俗眼诧，琴桐屡感知音聪。”⁴⁸沈葆楨出题《举逸民》仅认可了秦际唐的两篇答文，并评“独见真际，是不向墨裁讨生活者，后二有熊汉阳境界”“雅人深致，其味醺醺”，后更“命其子侄从子问业”⁴⁹于秦际唐。张士珩在官课中也颇为欣赏秦际唐，后命其子张伯鲁从游。

总的来说，在求学阶段，秦际唐的学术风格·理想追求·经济收入·内在价

46 秦际唐，《瑞华馆文稿序》，《南冈草堂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548页。

47 陈作霖，《惜阴书院东斋课艺跋》，《冶麓山房藏书跋尾》，屈万里，刘兆祐主编，《冶麓山房丛书》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第357页。

48 秦际唐，《送孙琴西观察入都用张啸山先生原韵》，《南冈草堂诗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488页。

49 秦际唐，《沈督部挽辞》，《南冈草堂诗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491页。

值和人际交往都与书院这一舞台密切相关。后来由于屡蹶春闱，秦际唐遂闭户课徒。其以山长身份在执教的几十年间更完美融入到了南京书院学人这一群体。

二· 执教：秦际唐与奎光·凤池书院

自同治四年开始的书院求学经历无疑为秦际唐带来了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愉悦，这既是其最平静舒适的人生阶段，也是其漫长人生道路最重要的奠基期。经济上略有盈余，良师益友相伴左右，同治六年更是顺利中举，满腹经纶的秦际唐似差一步就可高步云衢。同治六年秦际唐首次入都会试，至黑水洋却遇大风，雷霆狂飚中他惶惶不安，不禁感叹“浮名束缚令人死，不如归卧江之湄。”这也许是个预兆，此后十余年秦际唐屡试不第，开始了他人生极偃蹇抑塞的一段旅程。同治七年秦际唐报罢南归，遭遇捻军，得曾国藩赠金遣驿方才渡河，甚是窘迫。光绪二年(1876)秦际唐与陈作霖共赴会试，双双抱憾出都。多年南北奔走，连不得志，落寞中幸有恩师薛时雨勉励，“同堂言志，忽发深喟。谓我吏才，毋自颓废。”⁵⁰光绪六年(1880)秦际唐六试礼闱，诸考官争相赞叹，发榜却只为候补知县，“群以失士为憾”⁵¹，秦际唐作诗《庚辰下第南归》慨叹：“江上青山也笑人，劳薪何苦逐征尘。曾经浩劫悲多难，岂为浮名缚此身。”此后绝意仕途，键户授徒，先后任奎光·凤池书院山长，学堂既兴又迭充传习所总教员及初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以终其身。

奎光书院嘉庆二十五年(1820)建于鸡鸣寺侧，太平军毁之，光绪十二年由太守孙桐城于盩山阳复建，一循旧例，专课童生。凤池书院以造就应童子试者闻名，旧在上元县学内，嘉庆二十五年(1820)由知府俞德渊改建于旧王

50 秦际唐，《桑根师诔》，《南冈草堂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571页。

51 张佩纶，《南冈草堂文存序》，《南冈草堂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541页。

府“东北角之绣春园”⁵²，乱后荒芜，同治七年由知府涂宗瀛另购大夫第东新廊民舍兴复。同治十年至光绪九年(1883)张裕钊主讲凤池，书院声名大噪，张謇·范当世·马其昶·朱铭盘等俊杰皆肄业其中。

据笔者目前所见的史料文集，尚不敢确定秦际唐主讲两书院的完整时段，但可以肯定的是，秦际唐于光绪十二年至光绪十九年(1893)间主讲奎光书院，并是奎光复建后的首任山长。据秦际唐自述，光绪十二年孙桐城刚兴复奎光书院就授其假馆，当时秦际唐方落成新居南冈草堂，宴饮之乐还未消散，便匆匆移居盩山。光绪十五年(1889)十二月亦有“何善伯于岁除前一日偕奎光书院山长秦际唐以及顾云同游清凉山，憩于扫叶楼”⁵³的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邓弥之有诗记录“孟夏廿有八日秦君伯虞山长际唐”招众人拜访顾云新墅⁵⁴，而由“山长秦伯虞先生鉴定”的《金陵奎光书院赋钞》出版于光绪十九年。很显然，秦际唐至少在光绪十二年至光绪十九年间任奎光书院山长。至于秦际唐主讲凤池书院的时间，可从缪荃孙日记加以推测：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七年(1901)间，缪荃孙在钟山书院内主持雅集不下三十二次，而凤池书院山长秦际唐是集会里经常出现的人物。另有卢前记载光绪三十二年凤池书院改为津逮学堂时⁵⁵，“秦伯虞际唐任山长”⁵⁶。笔者大胆推测，起码光绪二十二年至光绪三十二年(1896-1906)这十一年间秦际唐担任凤池书院山长。在凤池改建学堂后，秦际唐继续担任总教员·教务长等要职。

秦际唐主讲奎光·凤池两书院时，以辞赋教学为主，并一循东南书院盛行刊发课艺的风气，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奎光书院赋钞》《金陵奎光书院课艺》《凤池书院课艺》(未见传本)的编选刊刻之中。《奎光书院课艺》赋作占比58%，

52 汪士铎等纂，《(同治)上江两县志》卷八《学校》，同治十三年刻本，第337页。

53 胡光国，《愚园诗话》，《南京愚园文献十一种》，南京，南京出版社，2015年，第820页。

54 邓辅纶·陈锐，《白香亭诗集·抱碧斋》，曾亚兰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86页。

55 徐传德，《南京教育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86页。

56 叶楚伦，柳诒徵等，《首都志》，南京，正中书局，1983年，第805页。

其余题材为试帖诗·古体诗·律诗及绝句。但与惜阴书院“取法乎上”⁵⁷不同，秦际唐之所以重视辞赋练习，是为了培养奎光童生的声律词章水平。盖童生参加的县试·府试·院试皆涉及诗赋。以县试为例，县试共五场，涉及诗赋的为后三场，“第三场试四书文或经文一篇·律赋一篇·五言八韵试帖诗一首·默写前场《圣谕广训》首二句，赋不作亦可。第四五场连复，则时文·诗赋·经论·骈文，不拘定格，时文或作一二起讲或作两比或作半篇，诗赋或作若干韵，经论·骈文或作一二段，限一二小时交卷，非写作敏捷者不能争胜。”⁵⁸此外，地方学政在院试前一般会举行特考，不考八股，而以近体诗·律赋·时文·策论各题目。这一系列的试赋活动使得如秦际唐之类的童子师通常会实行广泛而严格的试赋训练。

从课艺形式来看，秦际唐注意突出赋作的艺术鉴赏趣味，如用“同题”让学生参互效仿，用“和韵”强化学生声律训练，以“评点”直接指导生徒。笔者谨以《奎光书院课艺》部分赋作题目出处列表如下，试图展示奎光课艺内容，进一步揭示秦际唐的教学旨趣。

〈表 2〉《奎光书院课艺》赋作部分题目出处

题目	出处
《陈平分社肉甚均赋(以‘陈平为宰分肉甚均’为韵)》	《汉书·陈平传》
《大将军有揖客常赋(以题为韵)》	《史记·汲黯传》
《马伏波诫兄子书赋(以题为韵)》	《后汉书·马援传》
《堕泪碑以赋(以‘襄阳百姓建碑立庙’为韵)》	《晋书·羊祜传》
《郑监门上流民图赋(以题为韵)》	《宋史·郑侠传》
《朱衣点头赋(以‘朱衣点头其文入格’为韵)》	(宋)谢维新《合璧事类》
《红罗亭赋(以‘环亭四面都种红梅’为韵)》	(宋)陈景沂《全芳备祖》
《扬雄梦口吐白凤赋(以题为韵)》	《西京杂记》

57 许结，《论清代书院与辞赋创作》，《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6期。

58 商衍鎤，《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6页。

《淮水东边旧时月赋(以‘山围故国,潮打空城’为韵)》	(唐)刘禹锡《金陵五题·石头城》
《络纬秋啼金井阑赋(以题为韵)》	(唐)李白《长相思》
《魏武帝横槊赋诗赋(以‘酹酒临江,横槊赋诗’为韵)》	(宋)苏轼《赤壁赋》
《寒与梅花同不睡赋(以题为韵)》	(宋)陆游《遣兴》

从创作题材来看,秦际唐所出题目与科赋相比,随意性和自由度更大,艺术内涵也更为开阔,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出题独特.秦际唐出题选择的书籍有些并不常见,如《合璧事类》是涉及天文·地理·岁时·气候·时令·占候的事类著作,《全芳备祖》为专辑宋代植物的集大成者,《西京杂记》则是载录遗闻轶事的历史笔记小说集.历代试赋中较少采用这类书籍,秦际唐这一设计表现出其选题的独特性,但这些题目通常难度不大,主要是考验学生的文学素养和人情操.二是重视史籍.“清代试赋题出自史籍的并不多见,其原因大概是由于熟谙往史对士人而言虽然重要,但并未如儒经与部分子书般成为科考的指定教材”⁵⁹,但奎光课艺中未见经子书,源自史籍的赋题却占比45%,且涉及前后《汉书》《史记》《晋书》《宋史》《南唐书》诸多史册,这似与秦际唐旁搜博采·博古通今的读书旨趣有关.三是重视宋明人诗赋.清代试赋宗法唐贤,以前人诗作题多选择唐诗,“最突出的是用杜甫诗题·诗句为赋现象,表现出清人尊杜的心态”⁶⁰,但秦际唐多以宋明人诗作为题,如苏轼·陆游·陈景沂·龙鼎孳等人,唐人中则偏爱刘禹锡·韩偓.四是感怀伤逝之题多.题如《江上青山送六朝赋》《淮水东边旧时月赋》分别出自龚鼎孳《上巳将过金陵》和刘禹锡《金陵五题·石头城》,两诗皆以内在的对比暗连出金陵昔日繁华与今日的荒凉,抒发作者的幽咽暗恨,有吊古伤今的寓意在.同治三年后清王朝迎来了短暂的“中兴”,但西方窥视,朝廷内乱,边陲不定,内乱四起,知识分子在时艰迫来之际自会有徘徊之感与家国之思,秦际唐借诗赋引发幽情,或许也想借此督促学生以古鉴今,务求为有体有用之学,以备他

59 王瑜纯,《清代试赋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23页.

60 许结,《论清代书院与辞赋创作》,《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6期.

日栋梁柱石之选。

秦际唐在出题时还会对不常见的题目作注解，这是秦际唐教学细致耐心的表现。如《蜘蛛隐赋》一题其按：“《金楼子》云：龚舍随楚王朝，宿未央宫，见有赤蜘蛛大如栗，四面萦罗网，有虫触之而罥者，退而不能得出焉。舍叹曰：‘仕宦者人之网罗也’，于是挂冠而退，时谓舍为蜘蛛隐。以上云云，较叶青为详，故诸卷多从之，因附载于此。”⁶¹简明扼要的文字揭出题旨，诸生读题意可遣词，其用心之良苦毋庸赘言。

每篇课艺间有眉评，后有总评，评语中隐隐透露出秦际唐的行文偏好：一是强调气势。“龙虎之气胜跃而上”“真气惊户牖，笔力劲于千军之弩”，秦际唐重“气”，认为气盛则文章短长高下皆宜，轩轩霞举顾盼非常，这或与其归属桐城派有关，桐城派一贯主张“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⁶²二是注重创新。秦际唐尤为青睐“吐弃陈言”“扫尽一切公共语”的赋作，创新是建立在洗练功深的基础上，惟以实而不以华，以真而不以伪，方能洗尽陈言，作品也能垂世而可久焉。三是提倡清隽之文。赋作评语多见“吐属庄雅，右有左宜”“匀圆修洁，清无纤尘”“宗法唐贤，思清笔隽”，即“丽而有则·藻而不浮”始终是律赋之正轨，亦最与科举功名相应和。

此外，秦际唐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山水情趣。课艺中的风景题如《访随园遗址》《后湖权歌》《雨花台晚眺》《仿报恩寺塔遗址》，是秦际唐要求生徒在山水之乐中炼心·炼情·炼文的体现。南京山水在生徒的笔下勾勒成画，后湖“旧亭一角夕阳斜，小艇瓜皮入藕花”，雨花台“老树十围，枝翠沁骨”，南唐避暑宫“走马城西得得来，翠微一角委蒿莱”，秦际唐带领学生在夕照玉柳中养性修心，在相互唱和中抒发己感，在观景流连中锤炼出清隽文丽的好词佳句，而这一场景恰似重现了昔日东南诸生的逸游自恣之态。

总而言之，秦际唐教学宗旨虽以科举为重，但在某种程度上是游离于科举

61 秦际唐，《奎光书院赋·蜘蛛隐赋》，光绪十九年刻本，第15页。

62 刘大魁，《论文偶记》，舒芜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6页。

的藩篱之外。秦际唐在训练学生词章声律能力的同时, 十分强调读书明圣人之道。这既是秦际唐通博学术观的产物, 也是秦际唐从生徒过渡至山长过程中对曾经所受教育的自然流露。盖昔日肄业于钟山·尊经·惜阴书院, 诸师教育秦际唐“大之考镜古今得失, 匡时济世, 坐言起行, 小之亦作一经与雅颂比烈, 使天下知吾儒事业果非赘郎掾吏所能为也”⁶³, 这一通经致用的学术途径影响他在教学中自发自觉地指导学生沿着博而后约, 修己治人的方向前进。他的学生亦不负老师重望: 傅良弼光绪十五年举人, 二十四年(1899)进士⁶⁴; 夏仁虎光绪二十三年(1897)拔贡, 历官邮传部郎中·北洋政府秘书长, 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⁶⁵; 龚肇新历任江苏省议员·护法国会众议院议员⁶⁶。学生能鸣国家之盛, 新竹能高于旧竹, 全凭老竹的谆谆善诱。

秦际唐会选择在奎光·凤池两书院教学, 除与士人传道授业的观念相关, 更和山长丰裕的工资密不可分。以光绪五年(1879)凤池书院“山长束修三百两, 火食一百二十两, 节敬二十四两”⁶⁷来看, 凤池山长收入不菲。这个金额虽会因各种因素有所波动, 但历史悠久的奎光·凤池两省城书院应该具有充分的财力资源(经常性的官方津贴·多种形式的捐赠)支付教师工资。而秦际唐是一个声名远播的举人, 是官员正式礼聘的山长, 除确定薪酬外, 他也许还会获得“聘仪·程仪·薪膳·节仪等名义发放的钱款, 以及学生送上的一些‘孝敬费’, 即‘贽礼’。”⁶⁸ 张仲礼先生曾提出“书院山长平均350两银子左右的年收入, 是执教者所能期盼的最高收入”⁶⁹, 秦际唐一度同时执教两书院, 其工资应该远远

63 冯桂芬,《惜阴书院戊申课艺》,陈谷嘉·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930页。

64 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179册,第331页。

65 王景山,《国学家夏仁虎》,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3页。

66 《江苏省志》卷六一《议会·人民代表大会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83页。

67 汪士铎等纂,《(续纂)江宁府志》卷五《学校》,光绪六年刻本,第193页。

68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79页。

69 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第280页。

超乎这一水平。

长达二十三年的教学生涯为秦际唐带来了家产和名望的双重积累，他成为南京一地极具话语权的名绅。在学生时代，秦际唐不过是地方事务的次要参与者，如同治十三年(1874)修上元·江宁县志，光绪六年修江宁府志，他是分纂者·是跟随者。而晚年的秦际唐，已然代替汪士铎⁷⁰等人成为了南京地方事务的主要组织者和监督者，如光绪二十年(1894)承办救生局务，光绪二十四年(1898)督办五城平糶局。这种地位的上升，满足了秦际唐的价值认可需求，增强了秦际唐的社会责任感。处在这种名利兼有的境遇里，秦际唐是晚清社会的保守者·维护者也在情理之中。

秦际唐在“千古未有之局”的晚清，是时人眼中的“死板旧派”，他在书院一隅为自己和学生搭建起一个“保守”的桃花源，维护科举·学习笃志是其始终秉持的教育目标。19世纪的“智勇俱困之秋”逼迫清朝士大夫觉醒，以自强·变革回应西方成为时代主题，儒学在书院教育中的地位岌岌可危，以上海格致·求志书院，湖北两湖书院为代表的新式书院早已转为学习西学。秦际唐的老师孙锵鸣于光绪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95)间主讲龙门书院，这位耄耋老人接受姚文栋“科学·哲学·教育·政治，自我学习，起此夕斯”的建议，带领龙门书院迈入西学教育的大浪潮。相比之下，秦际唐这个弟子显得保守多了，光绪十九年编选刊印的《奎光书院课艺》仍以举业为务，虽有关注西方事务(如《眼镜》等篇)，但占比小·理解浅，比起西学自强他更愿意让学生通过阅读吴伟业的诗歌(如《读吴梅村诗》《读吴梅村集绝句》等)来以诗存史·警醒自身。再至光绪二十年，甲午战败击碎了士大夫最后的幻想，变法自强之说已嚣然不靖，但秦际唐与友人交谈时仍坚持维护纲常名教·拥簇科举取士，张佩纶不禁慨叹：“虽然以伯虞之才与识，使之蒐奇集异，综中西学术之得失而折以道要非不能也，退而自娱于斯文，其确然有以自守而不囿于风气者然也。”⁷¹

70 汪士铎，字晋侯，晚号梅翁。道光二十年(1840)举人，晚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藏书家，一生以游幕·接徒为业。著有《汪梅村先生集》《丙午日记》《南北史补记》等书。

但在那个新旧交替的转型过度时期, 将士人单纯划分为新派旧派, 显然过于简单. 有学者指出晚清文化人的思想观念并存中西新旧的“两个世界”⁷², 秦际唐虽忠诚传统, “但他脱离不开中西交织的文化环境, 并必须在新旧混杂的环境中生活”⁷³, 这就使他在保守的思想观念世界外还要适应一个更为复杂多样的文化生活世界.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 尊经·凤池改名校士馆, 秦际唐出任总教员, 书院之名遂退出秦际唐的历史世界, 然而两书院旧有的亭阁墙院及其建构的生活性的世界依然对其延续着, 并且秦际唐仍“策试四书经义·策论”⁷⁴, 还试图保持书院原有的学术精神. 光绪二十九年(1903)设崇义学堂, 秦际唐与陈作霖分主讲席, 以诗赋为主, 次年罢⁷⁵. 光绪三十二年校士馆改为初等师范学堂, 秦际唐迭充教务长, 事实上仍然没有离开奎光·凤池书院那一片长久生活的天地并终老于斯. 总体来看, 在新的文化环境中, 秦际唐顺应时势, 亦属积极参与新的文教事业, 寻求在变动的时代中立足, 但是秦际唐坚定地抱以“运会有盛衰, 而斯文之在天壤者一日不息”⁷⁶的信念, 犹然强自支厉旧学于世, 其在新式学堂中讲旧式儒学, 并萃一世精力蘄于古人文奥, 与友人编校《国朝金陵词征》《国朝金陵文征》《金陵词选》等书保存雅音. 秦际唐在特殊的时代中, 呈现出学术思想保守·文化生活趋新的两重世界.

71 张佩纶,《南冈草堂文存序》,《南冈草堂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541页.

72 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73 李长莉,《开放的时代与保守的个人:一个清末士大夫思想与生活的两重世界》,《学术研究》2007年第11期.

74 陈作霖,《可园备忘录》,卢海鸣主编,《教谕公稀龄撮记·可园备忘录·凤叟八十年经历图记》,第96页.

75 陈作霖,《可园备忘录》,卢海鸣主编,《教谕公稀龄撮记·可园备忘录·凤叟八十年经历图记》,第98页.

76 秦际唐,《金陵文钞序》,《南冈草堂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554页.

三·雅集：秦际唐与书院内外士人群体

雅集是秦际唐书院生活世界的一个重要的侧面。雅集，即是文人雅士吟咏诗文·议论学问的集会，史上较著名的有“金谷园雅集”·“兰亭雅集”·“滕王阁雅集”等，延及于晚清的动荡之世，在东南中国的金陵地区盛行不衰，并与书院结合起来。书院是晚清士人雅集的重要场所，书院士人又是当时士人雅集的特殊组成部分，从书院生徒到书院山长，秦际唐的雅集活动，或在书院之内，或延展到其外部，都与东南的士人文化生活一体相关。

早在从学时期，秦际唐就积极参加官员·乡绅·师长主持的雅集盛会，像光绪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胡恩燮在南京愚园举办的欧阳修生日会，与会人员如林寿图·薛时雨·张裕钊·赵彦修·孙文川无一不是耆老名儒，时林寿图为钟山书院山长，薛时雨为尊经书院山长，张裕钊为凤池书院山长，秦际唐以书院生徒的身份得以崭露头角。而秦际唐与同辈当时也有自己的雅集，如同治十二年(1873)的人日集会·光绪五年的上巳日集会等，雅集与官月课一起构成了秦际唐早期拓展人际关系的重要途径。后主讲奎光·凤池书院时，秦际唐则以山长身份参与缪荃孙·邓弥之·张謇·濮青士·郑孝胥·张士珩·翁长森等山长官宦组织的各式雅集，可以说雅集是秦际唐人际交往的最重要环节，他与东南士人在谯游玩乐中磋商辞赋，感怀时事，无疑是扩大了自己的交流群体和社交范围。

同光年间南京雅集如此盛行，究其原因：一是得山水园墅之助。玄武湖·莫愁湖·秦淮河·清凉山·一拂祠·扫叶堂·濠堂·愚园皆是游栖佳处。其中，不少雅集也在书院内或书院所在地周围进行，如云自在龕(钟山书院内)·薛庐(惜阴书院对面)之半壁池·宛在亭·有叟堂·寤园·深柳读书堂(尊经书院内)，以及盩山·蛇山·乌龙潭(尊经·惜阴旁)。诸胜美景如画，钟山讲舍“地偏少客，文债颇稀，差足养疾。鸣蝉在柳，阁波衡窗，时有清风，呼月到枕，昼抄暝写，心与古会”⁷⁷，

77 刘寿曾，《与郭慕徐书》，《传雅堂文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7册，第71页。

半壁池“浓阴所布，围吾堂如碧城，如翠□”⁷⁸，宛在亭在乌龙潭中央“凌空翼然，吐纳万景”⁷⁹，寤园“界竹篱为径，篱下植笃萝，旁行斜上，所在延缘。当其既花，如千万散金，星缀碧纱幃”⁸⁰，春秋佳日，载酒从游者踵相接也，亦在情理之中。二是薛时雨提倡“山水之乐”。薛时雨讲席尊经书院十七载，时常招友人弟子集会于薛庐，实与其创作观念有关。薛时雨认为人才之盛·文采之丽和山水之美紧密相连，他本人“杜门读书，振衣作吏，盖皆有山水之助焉”⁸¹。薛时雨期盼学子从山水之乐中体悟到文学创作的方法，曾用“蹄涔之水”“濯濯之山”的改造比喻“文之洁净”“文之藻采”的形成，认为“诸生能知山水之乐，则文境当日进”⁸²，良苦用心，令人钦佩。三是金陵雅集具有独特的道德性质。清代中后期的南京雅集活动反映了特殊的社会风气，士人召开雅集不再纯粹是沉湎美景，而是通过纪念先贤·品鉴金石等方式振奋士气，在山河破碎·风雨飘零中寻得心灵的慰藉。而书院雅集在道德层面上尤为突出，作为讲学的一种调节，学者们在雅集活动中仍“重视传道授学，书院雅集带有鲜明的道德印痕”⁸³。总而言之，南京雅集活动如此普遍，是与晚清士人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相契合的结果。

笔者谨以同光年间秦际唐参加的部分雅集列表如下，试以展示雅集活动的主要内容与秦际唐的情感变化：

78 陈作霖·陈诒绂，《金陵琐志九种》，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年，第506页。

79 秦际唐，《重浚乌龙潭记》，《南冈草堂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556页。

80 顾云，《盩山志》，张增泰点校，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81 薛时雨，《薛氏五种》，同治七年刻本。

82 薛时雨，《尊经书院课艺五刻序》，《尊经书院课艺》，《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1辑 第42册，第236页。

83 程嫩生，陈海燕，《石鼓书院雅集活动与文学创作》，《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表 3〉同光年间东南书院学人部分雅集考：以秦际唐为中心⁸⁴

时间	雅集情况	出处
同治十二年八月	与刘寿曾、陈作霖、朱绍颐、蒋师辙何延庆等人游后湖。	《可园备忘录》《南冈草堂诗选》《传雅堂诗集》《三径草堂诗钞》
光绪五年正月十二日	白香山生日愚园十八人雅集	《蒿庵类稿》《扁善斋诗存》
光绪六年十一月	薛庐落成，同门生会饮赋诗。	《可园备忘录》《南冈草堂诗选》《葢山诗选》
光绪七年三月	与杨朴庵、陈作霖游胡氏愚园，听煦斋主人及乔子衡弹琴。	《可园备忘录》
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何延庆、方培容作东坡生日会于秦宅	《甘元焕日记》
光绪十二年	新筑南冈草堂同人燕饮以落之	《可园备忘录》
光绪十三年	翁长森邀集大江南北诸名流三十五人，祭历代诗人于薛庐之有叟堂，礼成，会饮。	《可园备忘录》
光绪十七年五月廿八日	与刘寿曾、甘元焕等公祭顾亭林于治山麓，始立祠。	《甘元焕日记》
光绪十八年	饮集惜阴书院酒阑往访顾云新筑别墅	《白香亭诗集》
光绪二十二正月	与郑孝胥、张謇、蒯光典、陈庆年、陈作霖、顾云修楔于可青草堂	《扁善斋诗存》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	与陈作霖、司马晴江、周柳潭、郑叔龙作五老消寒会	《可园备忘录》
光绪二十五年暮春	具并文社社集，与集者十一人。	《白下愚园集续集》
光绪二十六年	与顾云、缪荃孙、俞明震、陈作霖、蒯光典上巳修禊之会	《可园诗存》

从上表来看，秦际唐所参雅集类型丰富，主要包括节日集会、季节型集会、风景游玩集会、先贤祭祀集会。

秦际唐参加的节日集会以人日、上巳节最为典型。秦际唐于同治十二年、光绪九年、光绪十二年、光绪十三年(1887)的正月初七在莫愁湖、薛庐等地作人日集，诸人品尝以“菰蒲荠韭梨笋栗”烹饪的七宝羹，在琼楼台榭中诵清风、追欢情，好不惬意。上巳(每年三月三日，又称“修禊”、“禊祭”)雅集则更为普遍，秦际唐于光绪六年、光绪十一年、光绪二十二年、光绪二十五年(1899)、光绪

84 参考《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06·734·736·737·753·757·759册及《可园备忘录》、《甘元焕日记》、《白下愚园集续集》。

二十六年(1900)·光绪二十九年·光绪三十二年均有作褺，地点包括薛庐·竹居·半青草堂·竹桥·乌龙潭诸胜。修褺自由性·随意性更大，常与其他活动并举，如光绪六年修褺兼寿赵彦修，光绪十一年作褺并饯别冯煦，众人在踏青游玩中，赏云澹碧水，望竹摇花重，酒龙诗虎，延续着古典文韵之风流。

秦际唐等人还常主持“送春”·“消夏”·“送秋”·“消寒”等季节雅集，在万物流转·四时变迁之际借唱和的方式吟咏内外环境的人物变迁。暮年之岁，秦际唐犹爱参加“消寒”会，如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与陈作霖·司马湘·濮文暹·朱绍亭)及次年十一月(与陈作霖·司马湘·周嘉朴·郑叔龙)的“五老消寒会”，这一熬寒盼春的无奈之举中更浸润着秦际唐对生活重塞·亲友离散的悲凄之情。宴上宾客有故友有新交，诸人言语中时常出现新政·改革·西学等词，宋学汉学已然哑音，抵掌而谈者亦非少年。此外，秦际唐于闲暇时也喜爱组织风景游玩集会，如同治十二年与陈作霖·何延庆等人集元武湖分韵作诗，光绪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招陈宗濂·沈瑜庆·王庭训·邓熙之·邓弥之饮集惜阴书院酒阑，众人赏景话旧，听琴评诗，为日常生活增添了浓郁的诗文气氛。

值得一提的是，在晚清特定的社会风气和思想倾向的影响下，秦际唐们淡化了先贤纪念集会的娱情色彩，更强调这类雅集特有的建构群体认同和政治功能。秦际唐们所选择的祭祀对象范围很广，主要包括前朝及本朝的贤者名士。先说纪念前代贤哲的集会，对象多为唐代的白居易·宋代的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众人借助先贤生日会来歌颂先哲的诗歌才华和忠贞品质，在万马齐喑中发出振聋发聩的慷慨之音，相互砥砺，鼓舞士气。再言纪念本朝名士的雅集，秦际唐的发迹和南京的复兴实与“同光中兴”密不可分，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曾国藩·林则徐·沈葆楨等一批中兴大臣成为了祭祀的首选，如光绪二年六月十六日秦际唐等人在妙相庵公祀曾国藩，而雅集活动亦常伴随纪念祠堂的落成，如光绪六年龙蟠里沈公祠(沈葆楨)落成作集，秦际唐们对诸公的纪念又何尝不是在继承和践行着“承当天下事”的士大夫群体意识？另外，秦际唐们受地域文化的影响，还选择了某些特定的祭祀对象，如光绪五年清凉山重建一拂先生祠，秦际唐与士绅作集并兼祀郑侠。北宋郑侠原籍

福州福清县，以“流民图”一事获忠义之名，他曾在南京清凉山寓居读书。再如光绪十五年十二月秦际唐与何延庆·顾云憩于扫叶楼并祀龚贤，龚贤乃明末清初极具气节的爱国主义书法家，曾在扫叶楼深居简出，不事权贵。秦际唐等人作集追慕郑侠·龚贤，既是二人清廉耿介·勤勉读书的高尚品质与当时士人心态与社会文化趋向相契合的表现，也是清凉山·扫叶楼借郑龚二人逐渐成为南京一地重要文化标志的体现。

秦际唐最常去的雅集场所是薛庐，而在薛庐举行的雅集从人员到主题都明显带有书院烙印。光绪六年十一月薛庐落成，薛时雨招学生首作雅集。最开始的薛庐集会多由薛时雨组织，并成为了师生切磋学问·交流感情的重要平台。自光绪十一年薛时雨离世，集会组织人转变为秦际唐这类有名望的薛氏弟子，与会人员仍以书院弟子为主，如光绪十三年薛庐挑菜会参加者吴瞻青·邓嘉缙·梅寿康·甘埏·顾云·秦际唐·何延庆·冯煦无一不曾是书院生徒。雅集的主题逐渐转为感怀恩师·关怀友朋·怀念读书时代，如光绪十七年（1891）秦际唐等人祀薛时雨并宴于永今堂，很明显，薛庐成为了秦际唐等书院弟子酬和雅会的首要选择。光绪九年的挑菜会最能展现出薛庐集会的具体场景和人文意义。是年正月初七，秦际唐与友人冯煦·陈作霖·甘元煥·方培容·朱绍亭·顾云相约集薛庐作挑菜会，当日微风细雨，乌龙潭水又添新潮，梅花倚槛吐蕊，竹影沿堤摇影，七种蔬筍整齐罗列在案板上，花影重重间是行厨在举炊，如此暇日风光，秦际唐回想往日宾会之欢，而经年却为浮名所缚，不禁感叹：“坠欢杳难追，清风尚可诵。俯仰随所遭，嫩寒袭衣缝。”⁸⁵冯煦以诗相劝：“所嗟世汶汶，且舍机种种，真想斂尘缚，毋为蠹在蛹。”⁸⁶陈作霖在清风稚柳中则想起七种蔬筍乃刘寿曾同治十二年所倡，然光绪八年刘寿曾已归道山，当时同游的朱绍颐·何延庆亦远在幕府，“山阳增感慨，旧雨怜迢

85 秦际唐，《癸未人日挑菜集薛庐分韵》，《南冈草堂诗选》，《清代诗文集续编》第734册，第499页。

86 冯煦，《癸未人日薛庐挑菜会分赋得种字》，《蒿庵类稿》，《清代诗文集续编》第757册，第101页。

遥。题诗寄幕府，乐莫忘渔樵。”⁸⁷不料世事无常，同年朱绍颐并没天津，而光绪十六年(1890)何延庆突发疾病卒于军中。显然，薛庐集会让秦际唐等人获得了一种优雅的人文氛围和诗意的栖居环境，在生活中的苦闷与彷徨在美景和言语中有所排遣，但集会人员的流动变迁也让他们深刻体会了时光易逝·生命易散的酸楚。对秦际唐来说，这种流动更令其恐惧与忧伤。秦际唐五十岁断弦，不久长女产难而亡，六十岁姬妾丧没，六十六岁二女离逝，可以说晚年的他孑然孤独，只有幼子秦世兰相伴于旁，与友人的集会让他窥见最难得的欢愉时光，但佳友相继殁谢，良会不再，久病缠身的他只能借书信与濮青士·张士珩等人诉说心中一二酸辛罢了。

对于秦际唐而言，雅集活动的精神旨归不在于赏玩，而是依托情感，雅集创作无疑是他释放情感的最佳渠道，品析秦际唐的创作成果，能清楚对比出他在剧变时代中由于理想和现实割裂而产生的悲楚与彷徨之情。同治十二年(1874)秦际唐与诸友在莫愁湖作挑菜会，作诗曰“百觴酒力醺，千里眼界拓。酒后发长啸，不顾俗子愕。我辈贵适意，生趣肯束缚，一笑褰幪人，终岁无此乐”⁸⁸，少年意气风发，憧憬着一日看尽长安花。光绪六年薛庐建成书院同门有宴饮之欢，秦际唐言：“此地昔贤憩，钟山有草堂。但闻耽涧谷，谁复集壶觞。吴越人材萃，师儒教泽长。生机逮花木，几日便青苍”⁸⁹，诗句浸润着勃勃生机和感恩之情，秦际唐誓以己身报效国家，不负师门期望。光绪十年(1884)秦际唐第三次作玄武湖集，喟叹“余游兹湖凡三，癸酉之游(1873)有耘芬·子期·幼瞻，己卯(1879)有恭甫。远者距今十余年，近者仅五六年，而耘芬·幼

87 陈作霖，《癸未人日与冯梦华(煦)甘剑侯(元焕)方子涵(培容)秦伯虞(际唐)朱豫生(绍亭)顾子鹏(云)小集薛庐分韵得挑字并怀子期善伯》，《可园诗存》，《清代诗文集续编》第736册，第252页。

88 秦际唐，《癸酉人日偕刘恭甫(寿曾)甘健侯(元焕)紫藩(曾源)朱子期(绍颐)豫生(绍亭)陈伯雨(作霖)何善伯(延庆)集莫愁湖作挑菜会分韵得乐字》，《南冈草堂诗选》，《清代诗文集续编》第734册，第487页。

89 秦际唐，《薛庐落成纪事和顾石公(云)韵》，《南冈草堂诗选》，《清代诗文集续编》第734册，第492页。

瞻·子期·恭甫皆宿草矣”⁹⁰，山阳之笛，黄公酒垆之悲，亲朋的相继殁谢表现出的是文情的日渐寂寥，而秦际唐频年奔走不得意，满腹才华无处施展，尘海劳生，再参雅集五味陈杂，不复当年的洒脱肆意。光绪二十四年，司马湘招同人作“寿苏”集，秦际唐感慨“今之新法甚熙丰，重见宣仁悯困穷。易世奸邪皆误国，千秋风雅孰如公…酒气熊熊添书稿，春风拂拂上琴弦。白头难得重相聚，老趁余间即散仙”⁹¹，面对清末政局日见危象，秦际唐不能也不愿独善其身，他既担忧外敌虎视眈眈，国家贫弱可欺，更忧虑圣贤纲纪的崩坏与世道人心的溃决。而已是风烛残年的秦际唐，除了固守本心，无计可施尔。

需要指出的是，雅集活动既满足了秦际唐等人的思想情感需求，还为他们构建起了诸个紧密联系的社交圈，而这些交际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士人个体及整个南京地域的发展。如光绪二十五年暮春，秦际唐与丁立中·金元鼎·司马湘·濮文暹·陈作霖·陆厚基·鲍穆堂·缪荃孙·沈维骥·傅春官集会于愚园，十一人相约成立具并文社，原定醪费按月一聚，以佳辰良辰为约。此设从光绪二十五年至民国元年断续社集7次，随后终止。民国四年胡光国再倡赓续雅约，最初十一人惟剩陈作霖一老，重建的文社先后拥有骨干成员36人，自民国八年正月初七至民国九年农历六月间雅集聚会多达20次，文社延续至民国九年。具并文社的代表从缪荃孙·陈作霖·秦际唐过渡到陈三立·程先甲·何允恕(何延庆之子)，雅集内容也从评诗赋文·观奕弹琴转变为以电话·电影·留声机·照相·民权等为题赋诗。可以说，具并文社的雅集及创作丰富了南京愚园的文化内涵，也再现了南京文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学活动，更还原了晚清的时代风云。而收录社员雅集创作成果的《白下愚园集》《白下愚园集续集》《具并文社唱和集》亦为研究晚清南京诗坛提供了重要材料。另外，秦际唐等人还赋予了雅集一定的社会功能。在地方公共事务竣工·乡邦文献刊成时，南京士人常会组织雅集庆贺，如光绪十三年十一月《金陵诗征》告成，

90 秦际唐，《后湖游记》，《南冈草堂文存》，《清代诗文集续编》第734册，第557页。

91 秦际唐，《戊戌腊月十九日司马晴江招同人寒叫寿苏即席赋此》，《南冈草堂诗选》，《清代诗文集续编》第734册，第514页。

秦际唐与里中耆彦及侨寓诸贤三十五人于有叟堂祭祀历代诗人并会饮，正如邓嘉缉《盍麓祭诗图序》所言：“盛事之传当以人重，岂直继西园雅集而起哉！”⁹²雅集活动极大满足了地方乡绅的名利需求，促使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组织参与地方事务，进而促进南京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总而言之，“因为物质生活富足和品质的提高，清代士人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从而有意识地追求优雅而诗意的生活方式”⁹³，秦际唐等人纷纷在节日·季节变迁·闲暇时光作雅集，以诗赋唱和增添风雅之趣，而受到社会文化风气和士人群体的思想倾向的影响，他们的雅集活动还增添了特殊的道德性质和政治功能。此外，创作成为雅集活动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众人分韵作赋，往复赓唱，或咏景抒情，或立志有为，或歌颂前贤，或感怀古今，凸显出深厚的史学功底和道德印痕。雅集讌游成为了秦际唐那一书院学人群体日常生活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四· 余论

读秦际唐早年诗歌，“少小偏逢丧乱时，穷途歌哭有余悲”⁹⁴是伤逝怀人·忧时感乱的悲怆，“乱世功名貂珥贱，穷苍生计雁鸣哀”⁹⁵是奔走道途·苦计衣食的颠沛，“英雄死后有遗憾，眼看吴越纷兵戈”⁹⁶是杞国忧天·毁家纾国的慨叹。

92 邓嘉缉，《盍麓祭诗图序》，《扁善斋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59册，第37页。

93 卢高媛，《清代诗人集会专题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27页。

94 秦际唐，《哭陆谔符四首之一》，《南冈草堂诗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484页。

95 秦际唐，《滬城感事和枢侯》，《南冈草堂诗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485页。

96 秦际唐，《哭张殿臣副帅》，《南冈草堂诗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484页。

南京克复，秦际唐结束自小的飘蓬流离，严师益友相伴，亲朋佳侣在旁，于钟灵毓秀的金陵山川中寻得一方静谧，在书院的从学·执教与交友是贯穿其一生的绳索，寄托着他对学术和思想的崇高追求，折射着他对天道性命的孜孜不倦，而讲学授道的目标即是晚清剧变中指引他选择的一盏明灯。秦际唐的生活轨迹正是晚清东南书院学人的典型呈现，这些学人在羁旅迁徙中坚守着儒家士人的理想，继承了从古至今书院所承载的精神理念，以书院为媒介共同为东南地区的文学·学术与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以秦际唐为代表的晚清东南书院学人，在锲而不舍的知识追求中阐释了人的意义·社会的和谐，实践着道·学·文·会等合一的士人生活理想。

【參考文獻】

- 陈作霖,《秦伯虞司马诔》,《可园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9页.
- 陈作霖,《可园备忘录》,卢海鸣主编,《教谕公稀龄撮记·可园备忘录·凤叟八十年经历图记》,南京,南京出版社,2020年,第62页.
- 陈作霖,《惜阴书院东斋课艺跋》,《冶麓山房藏书跋尾》,屈万里,刘兆祐主编,《冶麓山房丛书》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第357页.
- 张佩纶,《南冈草堂文存序》,《南冈草堂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541页.
- 濮文暹,《南冈草堂文存序》,《南冈草堂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543页.
- 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第198页.
- 顾廷龙,《清代朱卷集成》第148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第201页.
- 汪士铎,《何氏太宜人墓碣》,《南冈草堂诗选续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535页.
- 秦际唐,《桑根师诔》,《南冈草堂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571页.
- 秦际唐,《沈督部挽辞》,《南冈草堂诗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491页.
- 秦际唐,《丁亥孟冬展先生太孺人墓泐然有作》,《南冈草堂诗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503页.
- 秦际唐,《瞻桑根师遗像感而有作》,《南冈草堂诗选续编》,《清代诗文集续编》第734册,第504页.
- 秦际唐,《送孙琴西观察入都用张啸山先生原韵》,《南冈草堂诗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488页.
- 秦际唐,《瑞华馆文稿序》,《南冈草堂文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4册,第548页.
- 商衍鎤,《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7-38页.
- 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51页.
- 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卷二六《金陵杂述四十绝句》,同治六年刻本,第83页.
-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复周缙云侍卿》,光绪二年刻本,第618页.

- 薛时雨,《尊经书院课艺序》,《尊经书院课艺》,《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一辑 第37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7页.
- 胡培翬,《研六室六钞补遗》卷1《惜阴书院别诸生文》,道光十七年刻本,第486页.
- 胡光国,《愚园诗话》,《南京愚园文献十一种》,南京,南京出版社,2015年,第820页.
- 冯煦,《蒿庵随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 第64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613页.
- 孙锵鸣,《孙锵鸣集》,胡珠生编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 华世芳·缪荃孙,《龙城书院课艺》卷首《凡例》,光绪二十七年刻本,第1页.
- 汪士铎等纂,《(同治)上江两县志》卷12《艺文上》,同治十三年刻本,第414-417页.
- 孙锵鸣,《孙锵鸣集》,胡珠生编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1页.
- 陶澍,《陶澍全集》卷六《文集》,陈蒲清主编,长沙,岳麓书社,2017年,第110页.
- 朱珔,《钟山书院课艺序》,《小万卷斋文稿》,《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94册,第236页.
- 程嫩生,文洋,《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2期.
- 刘琪,《清代书院的膏火奖赏—以助贫养士为中心》,《教育评论》2006年第2期.
- 汪士铎等纂,《(续纂)江宁府志》卷五《学校》,光绪六年刻本,第192页.
- 顾云,《桑根先生行状》,《盩山文录》,《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59册,第695页.
- 贾米森,《中国的土地占有和农村人口的情况》,《皇家亚洲学会杂志·华北分会·新系列卷23》,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2页.

Abstract

The Academy Life World of the Southeast Schola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Qin Jitang—

Wang Seung Gun*·Yuan Yuan**

Carefully review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we can find an interesting phenomenon, that is, the academies were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the life and world of the schola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re closely related. He studied in Zhongshan, Zunjing, and Xiyin Academy during Tongzhi, and lectured in Kuiguang and Fengchi Academy in his later years. After the school flourished, Qin Jitang, the chief teacher of the school and the dean of the junior normal school, was a generation of academies A microcosm of the school life, its academy life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inner spiritual world and life pursuit of the southeast scholar communi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is a rich stroke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educational history and the life history of scholars in the southeast reg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 : Academy, Qin Jitang, Living World, Southeast

논문 투고일: 2022. 10. 15 심사 완료일: 2022. 12. 15 게재 확정일: 2022. 12. 22

* Professor of Chinese Culture Academy, Guizhou University

** College of History and Ethnic Culture, Guizhou University